

承诺态度的

Wang Hongsheng Zhu

王鸿生 著

事到如今，生活、写作已越来越像一种态度的选择，不，它们已越来越成长成为一种态度的选择。态度是唯一可以由我们自己作主的事情，所以，它具有当下的确定性，它标出了现在的主体的位置。我知道，人的处境、意识常常是分裂的、悖谬的，而真正的智慧则是暧昧的、怀疑的，但如果因为这一点而放弃必须的承担，那么人就将失去其基本的存在面目。



火鳳凰
新批评文丛
总体策划：陈思和王晓明

学林出版社

态度的 承诺

Wang I

王鸿生 著



火凤凰 新批评文丛

总体策划：陈思和王晓明

学林出版社

态度的承诺



作 者 王鸿生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王晓阳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120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 常熟市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6万

版 次 199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

书 号 ISBN 7-80616-569-X/I·206

定 价 14.00元

序

孙 荪

在文学界，有一句流行话说，文学是时代精神的产儿。

这里的文学，在下意识中，似乎主要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的创作，文学批评和理论形态的写作，是不是这种“产儿”呢？追问起来的时候，当然毫无疑问，如果不去特别提起，就有可能把后者忽略掉了。

当我系统地阅读（有相当部分是重读）选入在这本论集里的文章时，这句话，或者说这个思想，在我心里反复地得到了“重温”。

我无意把谁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范例或代表，因为一个多元时代的精神产儿必定是多样的。但是，纵观王鸿生最近十多年来所走过的批评道路，说他的思想轨迹和探索成果，“反映”同时也“反应”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思想乃至精神文化的某些簇新的层面和发展的关节点，以及新生的矛盾和面临的问题，则不能算是夸张。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王鸿生，如果不说其是“应运而

生”，也应当说是“生逢其时”的。这个“时”是多年不遇的、以张扬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和提倡批评的独立创造精神为初期特征的批评变革时期，如他在12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富有激情地作过的判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来说，1985年才是真正令人难忘的‘批评的早晨’。”关于批评的自主地位和批评家的主体创造精神，当时“几代”批评家都呼喊着的相同的或相似的口号，但似乎由青年王鸿生们发出的声音是更加自然的。

自主和创造，能够作为文学批评的主张和口号提出来，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比如80年代前的中国文学界，是不太可能的，只是到了‘85新潮时期，看起来，喊喊它才是轻而易举的了。但是，要在批评实践中，真正贯彻下去，体现出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情。

且不说在20世纪整个的精神文化语境中，仅仅在和当代作家的创作水准相比较之下，你这个批评家的“自主”和“创造”发挥得如何，一旦进入批评实践，这的确酷似一场公开的考试、较量和展示。真的是，一不小心仍然会“不由自主”、“身不由己”的。

问题取决于批评家的素质。所谓素质，说的是整体的综合的指数。从根本上说，一个好的批评家，首先必须具有良好的艺术感知力和深厚的基础理论功底，“自主”之根就扎在这里。正是从这里开始，王鸿生以他的纯粹、执著和才情，逐步显示了自己的长处和影响。

王鸿生痴迷于文学是很早了，年轻时是个很投入的诗歌作者，有不少作品问世。他的批评活动开始于80年代初期，但是，严格地说，王鸿生是从认真梳理新时期文学批评观念的衍变正式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从1985年写的那篇描述批评观念的长文可以看出，那时他才真正确立这样一个意识：自

己正在参与和投入的,是创造现代中国文学批评学的工作。显然,这一工作必须在理论和应用这两个方面,同时获得并证明自身的“现代性”。正因为如此,那些相沿成习的批评模式恰恰应当从根本上改造或者抛弃,应当把新时期的文学经验,置于空前广阔的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以至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视野之下,置于当代中国的独特境遇之中,进行观察、理解、阐发和清理,否则,就不大可能形成有效力的批评思想、方法,乃至语汇、表达。

十多年来,为了寻求批评的语言,为了找到建构更加理想的批评框架的通道,王鸿生的思考和写作一直是围绕纯理论问题和具体文学现象这两个方面并行展开的,这从本书的目录就可以看出来。对他自己来说,除了两方面都有兴趣之外,最主要的恐怕还是想通过理论探讨和实际操作的相互促动,来帮助自己接近和推进理论批评的学术目标。从多方面作积累,从长远角度向自己提要求,这当然是很好的事。但就单位时间内的运作方式及效益而言,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其利弊就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了。有时,读他的文章,文学界的朋友觉得“太哲学”,而哲学界的朋友又觉得“太文学”,看来,这已成为某种“话语症状”了。细想想,这未必不是他的一种优势,但毕竟也是有几分尴尬的。

从80年代到90年代,王鸿生一直跟踪着极富变化的复杂的小说世界,但在选择批评对象时,似乎没有特别着意于那些热点作家、作品,不大从是否已产生轰动效应的角度选择批评对象。进入他批评视野的作家也不多。不过,一旦选择了某个批评对象,那就会下大功夫把它做深做透,并且做得独到。一般地说,他比较注意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基本审美视角、主要意象和创作方式有所发现和概括,进而在理性上予以延

伸和提升,在艺术上提出建设性的意向——有时,也不免造成批评对创作的“僭越”。应该承认,他的表述很具有思辨性、穿透力,落笔也准确、讲究,但90年代前的文章中隐含着俯瞰姿态和判断口吻,似乎也不乏某些“话语权力”的味道。我想,他后来着力思考叙事语态问题,也是包含着对自己的审视和批判的。

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范式转换相呼应,王鸿生的批评路向,明显地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学批评到文化心理研究再到叙事分析的过程。这一方面受制于发展着的创作现实,“对象选择方法”是文学批评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另一方面,当然也反映出他的总是难以满足于现状的个性。他对知识批判怀有对社会批判一样的热情。尤其对当代西方哲学、文论著作,解读书重点不断变换,如对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理论等都有系统的把握,学术视野显得非常开阔。撇开某些负面作用不谈,这样做去的好处是,的确使他多了几套新式的“枪法”,从80年代一步步“走”进了90年代。

我们看到,在考察叶文玲的创作时,他显示的是美学和社会学批评的思想力量;对王朔的评论,则选择了心理分析和原型批评,将其主要作品归为一个现代人沉沦的基本故事来解读;论述乔典运,又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文化寓言”的概括,展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空间;而在涉及史铁生、余华、王小波、北村、韩东、迟子建、虹影等一批作家的文本时,他通过细读式的叙事分析,提炼出诸如祈祷、观察、反讽、默想等语态范畴,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第一次(或许?)明确将“叙事语态”与存在姿态关联起来作了研究。

在这本集子里,王鸿生有意识地选入了他不同阶段写下的评论文字。于作者自己来说,这自然是一份“备忘”或“存

照”；对读者而言，则易于在前后对比中看出这个时代的“话语”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批评实践，虽然在方法上跳荡很大，变化亦多，但是并没有采取狗熊掰棒子的做法，试验一个扔掉一个，而是将他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思想结合成一个有机的链条，形成一个在兼容中发展的过程，从而带来了某种统一感。可以发现，在其进行文化心理研究时保留着社会学批评的有价值的内涵，进行叙事分析时，尽力涵摄着社会学批评和文化心理研究的有用成分。这就使他的“立论”不是以“片面深刻”的“危论”取胜，偏颇较少，也较能经得起时日的考验。

文学批评家自然而然的天职，或者说存在的理由，就是面对当代文学的经验事实，运用理论于对当代创作的批评，同时总结文学创作的经验，以上升为理论形态。这就要求批评有所“悟”，有所“思”，有所“问”。有赖于对当代生活的深入体察，也有赖于他累积多年的专业素养，王鸿生的批评似乎更倾向于在人生与艺术、经验与学理之间建立起某种平衡。他所关注的问题，他在文学的某一个发展阶段所思考、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是一些处在“人本”与“文本”之纽结点上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些“活”问题。

比如，作家李佩甫从这样一个角度吸引了他：一位通常被视为“现实主义”的作家，何以会日渐焕发出一种诗性叙事的魅力？那些超越了作家个性的神幻质素究竟缘何而来？由而，他很“微妙”地描述了他所意识到的作者“叙事意识”的发展过程，一直追溯到根植于李佩甫心中的“道德关怀”母题。当信赖乡村生活的“道德自理”能力时，其故事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认同和同步；到社会转型种种伦理秩序濒临“解体”而陷入“道德困惑”时，其叙述视角从以往习惯的社会“观察”转向了对童年的回忆和家族往事的诉说。为何会这样？王鸿生

认为,作者的隐蔽动机是向历史寻求存在基础和道德庇护,也就是说,是通过虚构“历史”,通过在“往事”中投放“意义”,即对传统道德的幻想性寄托,表达作家对于家族命运、人的命运或某种“终极价值”的深切而慎重的关怀。正是这种“道德拯救”意向和叙事策略,使小说成为“历史神话”和“寓意神话”得以说出。

说实话,当我初一看到他“从神话视界”的角度研究李佩甫的创作时,是心存疑虑的。当我读完他的文章,我理解了他所关注的“问题”的焦点:我国现当代乡土小说的空间维度“缺失”在哪里?

面对着“道德关怀”,他这样进行不依不饶的追问:一个“德”字能应对现代人的复杂处境吗?又该以何为“德”,新的价值基础是在过去、现在抑或未来?为什么当代文学的“道德关怀”极易倾向于普遍化而独独易疏忽了关怀者即书写者本身?这个“我”怎么会失落在“普遍”之外?而这一“失落”,又意味着哪些叙事方面的后果?

他批评这样两类创作现象:某些充满民族、历史忧患感的作品往往无力传达个体灵魂的消息,作者自身的生命经验唤不醒、不出来;而另一些长于心灵漫游或精神分析的作品,却又因滞留于个体意识、无意识的开掘,终难形成浑然、博大的艺术气象。他认为,这是李佩甫的不足,也是整个汉语小说在叙事空间上存在的问题,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既能“盛”下“我”又能“盛”下“世界”的“虚涵万有”的语言。也正是有鉴于此,他提出“乡土小说”的空间维度应当从“人/土地”的物性层面和“人/乡土”的人性层面,推进到“人/大地”之神性联系的维度,“重建生存意义,重建大地与人生命攸关的联系”。这实际上就是他的神话诗学主张的逻辑推演。他是不是已就此提

出了更加具体的论证和理路,似乎还不忙作出结论。但他所表达的意向,对于清醒地认识当下的文学现状,寻找新的叙事前景,则无论如何是具有启示甚至提升作用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代文学批评所遇到的问题和谈论的问题,往往具有极大的现实感和整体性。因为文学是直面世界和人生的,是无所不包的。对文学的批评常常不能不是对个体、群体以至整个人类的当下境遇和历史命运的思索和评价。文学批评又是关于“文学”的批评,不能不讨论如何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人的存在状况和精神心灵的问题,讨论如何言说才能使文学的表达适宜和美妙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把文学及其批评置于当代精神文化矛盾的深部和前沿,它几乎是迫使文学批评家去关心当代的人文境遇问题和语言问题,并对之保持足够的敏感。

王鸿生在理论上的投入促使了他在这方面的自觉。不仅是保持着对当代精神文化问题的敏感,而且在努力作出回应的同时,提供有重要价值的思考,进行个性化的探索。作为一个批评家,在关注丰富而又驳杂的理论现象和文学事实时,他具有相当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先后对创作心理、创作活动的模糊性、情感现象的二重性、80年代中期的文学批评观念和90年代的写作问题,都发表了富有创见的专论。特别是近年对神话诗学、交往理论及叙事与价值之关系等问题的深长思考,则更具有前瞻性和尖锐性。读他的关于“神话”的文章和关于《去年在马里安巴德》的评论,可以看出他的深心,针对目下文学原创力的萎缩而提出应对策略,企望以“神话”激活想象力,开拓汉语的叙事空间。而他之所以下劲研究“交往”、“态度”、“话语风格”等,并专门写了一本思想随笔《交往者自

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则是从更深刻更具内在性的理论层面上消解话语权力机制,同时拒绝后现代文化中将虚无“主义化”的倾向。

“无神的庙宇”,这是王鸿生问题单子上最使他挂心扯肺,也可能对文学极具警世意义的重大问题。当代人文精神问题的一个基本难点是,必须找到不放弃信仰又直面虚无的可能性。他提出了这个论断,并且认为,在这个多元纷呈的世界上,在这个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置的世纪末,每个人文知识分子都在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与此相应,也在寻找自己的话语方式。作为一个写作者,不能不重新思考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他用了一对隐喻来表达他的立场和追求。他说前现代话语是有神有庙的,后现代话语是无神无庙的;他受不了前现代的专制,却向往它的虔敬;受不了后现代的狂妄,却向往它的自由。于是,王鸿生提出他要寻找第三种话语即既虔敬又自由的话语,他把这种话语命名为“无神的庙宇”,意在表明,在废除了实体性、人格化、目的论的“神”以后,仍要保留“庙宇”即语言活动的诗性、仪式性乃至神性。这正是“不放弃信仰又直面虚无”的隐喻式表达,用他的话说,也叫一种“界面性表达”,或谓“态度的承诺”。

这些富有挑战性的思想当然是可以讨论的,王鸿生自己也一再认为,他所思考过的一切,都只是一种“言说的准备”。因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将《无神的庙宇》、《态度的承诺》这对“姊妹篇”琢磨一番,辨析一番。但我以为,其价值却不应当以最终是否正确来作为判断的依据。哲人们已经论述过“提出问题”在解决问题全过程中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

我最近读到王鸿生关于评论家南帆的一段评论文字:“看来,学术与思想、敏锐与沉实、智力因素与道义因素均衡增长

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就一个批评家的素质而言,仅此一点,已足使人感佩。更可贵者,南帆的问题意识很尖锐,而话语的界限意识又很清晰。这使我相信,在形成多维视野以避免独断论时,一种有立场、有操守的批评,更是可能且应该存在的。”这段话,如果不说是“自况”的话,作为对自己的“期待”,应当说是没有疑义的。如上的叙述,虽然只说到他的理论建树的一部分,也已经可以作出证明了吧。

面对王鸿生的论著,我常常想到其人。他是何方人士?在全国文坛上,人们自然会说,河南的王鸿生!在河南,人们通常会说,王鸿生,上海人!他初中毕业后,就在那个时代的鼓动下,怀抱着一腔激情,从上海来到河南兰考农村插队,时为1969年,至今已近30年矣。他的人生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中原度过的,尽管从农村到县城到省城,由农民到工人到教师再到研究人员,几经磨砺,这位在黄浦江边出生的“鸿生”却在黄河岸边成就了人物,成了时代精神产儿中的“这一个”,也可以戏称之为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混血儿”吧。他的人生经历怎样影响了他的思想、学术品格与人格,各方面的得与失如何剥离和计算,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但它肯定是十分有意思的话题。

就好的一面说,南方人的聪明机敏和灵秀与中原人的沉稳厚重和包容相结合(这样进行一般性的概括人们认同吗?概括就必须省略,只能如此),也许对他发挥天性中的诗性禀赋和深刻的理性求索精神所起到的良性影响是主要的。比如,善于敏锐地抓住“问题”,又能够沉下心来做足做深;在锐意创新的同时,又能够坚守一些根基和操守。这是不是因为“混血”而产生的结果?当然,与之而来的“短处”和“劣处”也可能都在他身上有所反映。比如,文化创造的“效益意识”淡

薄,有了创新“产品”也不去着意包装宣传,以不求轰动为荣;不能在更大范围产生影响,也不以为憾;敏感快捷的前沿意识,被厚重徐缓的边缘氛围所困,而能够忍受甚或认同,等等。

仅仅从地域的角度来立论,容易落入简单化。我这里想说的其实要丰富得多。“上海人”和“河南人”,已经不仅仅是个地域性概念,主要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性格类型。这种不期然而然的碰撞与交融,好处可能更大些。这当然还要取决于个人与环境的其他因素。话有两说两解,多说多解,我想提起的,是鸿生对自己“何方人士”的自觉,说不定会有益处。

作为一篇序言,已经长了,但似乎仍然意犹未尽。有许多东西,是我尚未,或者说尚不能消化的。有一些,则可能解读错了,或者不着边际。我愿把这些阅读心得就教于作者和读者。最后,我想告诉大家:文坛和学界将会在他的作品中发现更丰富的东西。

1998年3月于河南省文学院

目 录

1	序	孙 荪
1	无神的庙宇	
	——20 世纪神话诗学问题	
26	态度的承诺	
	——语言学转向后的交往价值问题	
40	论情感现象的二重性	
63	评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	
70	模糊性:在创作运动的层次上	
78	智慧的成长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念之衍变	
92	向边界冲刺	
	——90 年代写作问题思考	
107	对生活的消化	
	——给《水泡子》作者的信	
120	小说的征迹	

126	感觉世界的迁徙
132	叶文玲和她的命运女神
143	乔典运和他的文化寓言
158	李佩甫和他的神话视界
174	英雄:消亡与重现
180	风景:在沉沦与期待的界面 ——读王朔近作
188	他们,或四个四重奏
194	抒情的锥子
198	与日常存在照面
204	祈祷、反讽与默想
234	想·说·走 ——《去年在马里安巴德》解读
253	代跋:话语风格,或言说的态度

无神的庙宇

——20世纪神话诗学问题

20世纪神话研究展示着一幅拓扑式图景。它在方法论上提供了如下三种考察神话机制的认识范型：(1)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文化生成图式；(2)心理学意义上的无意识—意识转换图式；(3)符号学的世界—代码关系图式。如果将此三者并联起来作相关考虑，人们则不难形成这样一个初步印象，它们大致分割了神话在一般社会—历史层面、集体—个体心理层面及形式—意义层面上的多维度功能作用。

值得重视的是，正如拓扑学研究的是几何图形经过连续形变后仍能保持的性质，语言的性质也一再成为各种神话诗学理论共同关注的焦点。与此相应，诸如对语义、语象、语构、语式及语用的不同分析原则，也已广泛而具体地被贯彻到神话阐释的操作过程中去了。由此所取得的进展和引起的批评，人们似乎已不太陌生。

二

20 世纪神话诗学之所以表现为一系列语言反思的积极后果又困顿于语言的反思,并非出于偶然。一般地说,语言不断发生离异的动力过程正导源于语言内部隐匿着的自我批评性质,而这一性质同样也存在于人们对神话的陈述之中。注意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在思考语言和神话的关系时意识到其中所包含的困难,这困难归根结底乃是用语言说语言的困难。

由于语言与神话的奇特交织和纠缠,我们甚至很难寻找到一个探讨两者关系的起点。就神话现象是语言进步的必然结果而言,我们几乎可以认为,神话的秘密正寓于语言的秘密;但同样,由于语言的原始来历至今仍晦蔽不明,又由于虚拟性乃是语言也是知识以及一切文化形式之特性中隐藏得最深从而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度,我们又可以认为,语言的秘密也寓于神话的秘密。假如这两种说法同时有效(这在目前大概是难以避免的情况),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无疑是又一个“解释学循环”的例证:为了理解神话,我们必须先理解语言;而为了理解语言,我们又必须先理解神话。

为了走出这个怪圈,按传统思路,似乎只有返回到语言或神话的起源上去——然而,在发生学上,无论是神话的起源还是语言的起源,都属于那类早已失传的秘密,一种人类智力及其延伸方式(如技术工具)已难以追溯的秘密。以至连列维-斯特劳斯也只能说:“按动物界的标准衡量,语言的出现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刻,任何情况下,它也许会在一次猛扑中诞生。”(《马赛尔·莫斯著作的引言》)可以想见,对于这样的秘